

# 从行会制看永新民间婚嫁唢呐手组织——“伙”

胡小东

[内 容 提 要] 同业为行,是自古以来就形成的一种传统市场秩序规范。即或是现代社会,仍沿袭着这种习俗惯制。否则,必然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伙”是永新民间婚嫁唢呐手自发结成的一个类似行会的组织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它扮演着类似行会组织却又与其不尽相同的角色。

[关 键 词] 行会/“伙”/唢呐手

[内 容 类 别 词] 民族音乐

## 行会的相关概述

一般来说,当某一事象自由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并期望能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时,必然会催生一个相应的机构或组织来对其进行约束和有效的引导管理。行会组织的产生就是如此。在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时,为了调整同业关系,解决同业矛盾,保护同行利益,协调与政府的关系,同业或相关行业联合起来组成行会。

“行会”,即“同业行会”。同业为行,是自古以来就形成的一种传统市场秩序规范。即或是现代社会,仍沿袭着这种习俗惯制。否则,必然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sup>[1]</sup>有关中国行会的明确文献记载,史见于唐初约7世纪前后。唐贾公彦在高宗永徽年间(650~655)所著《周礼义疏》中,曾将《周礼·地官》中的“肆长”比“若今行头者也”,无行会组织,何谈“行头”。两宋时,行会组织的名目已有多种,如行、团、团行、作、社、会等。而且,除工商诸行之外,娼、赌、杂技等市井娱乐乃至乞丐之

类江湖社会,也都形成了同业行帮组织。<sup>[2]</sup>

鼓吹业,是于婚丧节庆等活动中受雇吹奏乐曲的行业。据明沈榜《宛署杂记》所载,当时的宛平(今北京)即已有了“鼓吹业”同业组织。<sup>[3]</sup>由于这个行业长期以来被列为下九流的末等,历史文献很少有关于它们的记载,就是各代地方志书也难觅其踪迹。因此,关于对由此行业形成的同业组织的记载也是少之又少。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现代某些地区的一些民间鼓吹乐(班)社的留存发展,窥其历史的风貌特征。如张振涛在其《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一书中描述的京畿地区活动着的“音乐会”和吹打班这两类乐社,尽管没有一个关于这一行业的行会组织来对其进行管理,但“他们在从事艺术活动的观念上,却持有或说操守着截然相反、判然比对的宗旨:一是‘不受雇用、无偿服务’的音乐会;二是公然声称自己活动的目的是为谋利的吹打班。”<sup>[4]</sup>他们彼此都遵守着一种隐性的近似于同业行会规约的约束力,恪守各自的规矩,各司

其仪。而形成于21世纪初的永新<sup>[5]</sup>民间婚嫁唢呐手组织“伙”,则是当下的一个具有自己特点,并值得关注的类似于同业行会的组织形式。<sup>[6]</sup>

### 关于永新民间婚嫁音乐形式

永新民间婚嫁音乐的乐队形式是两只唢呐和四件打击乐器(鼓、镲、丁锣、大锣)的小型鼓吹乐合奏。<sup>[7]</sup>这几乎与陕北礼俗音乐的主要形式<sup>[8]</sup>如出一辙,不同的是,陕北人称他们这种小乐队合奏为“鼓乐”,而永新人对他们的演奏形式却是分开来称呼的,分别叫做“唢呐”和“锣鼓家什”(即鼓、镲、丁锣、大锣)。在生活中,举办婚嫁的人只要雇请“唢呐”,而不需请“锣鼓家什”,因为唢呐手要预先雇好,需要付报酬,而“锣鼓家什”是现成的,每个自然村都有至少一套,乐手都是临时从村里人或喝喜酒的亲朋中凑数的,不需付报酬;喜事办完,锣鼓收归原处,乐手也即自动解散。也就是说,陕北的礼俗音乐有自己固定的班社组织——“鼓乐”,而永新的民间婚嫁音乐则没有,甚至没有一个固定的组合形式。这种情形,从历史中已经很难去加以考证,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在永新民间婚嫁音乐中,唢呐是占据主要地位的。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人们观念转换的当下,“伙”作为民间婚嫁唢呐手组织应运而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对于陕北礼俗音乐来说,“伙”就相当于当地民间婚嫁音乐中的班社组织。

### “伙”的产生及发展现状

在古汉语中,“伙”同“火”。古兵制十人为火,同火的人互称火伴,俗称伙伴,同伴[partner mate companion],如同伙、伙家(伙伴,相与共事的人,对同辈人或同伴的称呼)。永新民间婚嫁唢呐手的“伙”则是伙的延伸意义“合伙”的意思。“合伙”即是由若干个人结成的一群[partnership],如入伙、成群结伙;合伙(合股营业)。<sup>[9]</sup>永新婚嫁唢呐手们三五成群,或志趣相投、或地域相近、或技艺相当,为了保障大家的利益等原因自愿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伙”,没有明文的规定,只有约定俗成的简单的不成文规约。

对于“伙”的创始人,当地的唢呐手们大都认为是烟阁乡水尾村的唢呐手龙霞圣。对此,他本人却并不能确定,或者说不太在意。但根据他的资历和技术<sup>[10]</sup>和他自己的叙述,应该是有这个可能的。上世纪90年代始,当地的青年男女大多出外打工,因此婚期一般都集中在腊月的下半月和正月的这段时间里。尽管龙师傅收费比一般人贵,但因其技术好,所以请他的人还是很多。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去几个地方“吹唢呐”,且每次都差不多要花去一天多的时间,<sup>[11]</sup>所以很多机会只能放弃。而技术欠佳或名气不大的唢呐手却往往很空闲。另外,尽管每次婚嫁用乐都需要两名唢呐手,但两个唢呐手往往不太相熟,所以,如果碰到一个技术差的搭档就必须跟着对方吹奏;<sup>[12]</sup>当对方吹奏的曲牌非常有限时,也得跟着对方一起反复演奏那有限的曲牌。这不但使龙师傅的水平得不到正常发挥,还会让别人以为他是在“滥竽充数”,但又不能不顾及对方。鉴于此,龙师傅便萌发了要把几个技术相当的同行联合起来,组成一“伙”的想法。这样,不管是“生意”的资源还是曲

牌和技术的交流等方面,大家都可以互通有无,不会形成浪费。

龙师傅的“伙”起初只有他和邻村的樊厚德两个人,后来又陆续加入了同乡的邱仙义、李光然、汪冬桂,一共5人,而龙霞圣自然就成了“伙头”。很快,其他同行也都意识到“伙”的好处。于是,大大小小的“伙”便像雨后春笋般遍布当地。“伙”的存在往往会使单干而技术欠佳、名气不大的唢呐手的“生意”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因此,新手们、或者技艺不佳者都会想方设法找个“伙”加入。

### “伙”的规约

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规矩不成方圆。作为行会的制度民俗,行业规约主要是从行会宗旨、组织办法、从业行事规范和行业道德规范、团体的信仰、活动方式、财产管理,以及成员的权利义务、惩罚违规办法等方面加以统一规范。必要时,甚至连收徒、交易方式及时价之类,也十分具体地写进规约。行会借业缘、地缘、神缘或其他功利性需求形成之后,则需要一系列成文法或不成文法的制度调控内外的各种结构关系,以此来维系组织的存在和实现其组织的功能。<sup>[13]</sup>历史上对此的文献记载同样也非常少见。《行会史》一书为我们描绘了清同治八年(1869)五月初七,沪上青浦县朱家角土地祠旧址,立有《为禁吹手勒索并规定吹手工价告示碑》,碑文称:“前廉照会敦善定价吹手等项,每日每人不得过二百文,喜钱不得过一百文,丧葬减半,贫民用不满日酌给,其余脚夫、炮手等项亦然。环求给示勒碑永禁等情到县,据此。除批示外,合行给示勒碑永禁。”<sup>[14]</sup>

上述以及大多数其他的行会,其规约都是必须用白纸黑字写下来,形式非常正归,具备行业法规的效力。而“伙”的规约却几乎都没有形诸于文字,它的成立往往只是某个稍具影响力的唢呐手召集与其相熟的几位同行聚到自己家里吃顿便饭,在席间进行“伙头”的选举,然后由“伙头”提出,或者由大家共同制定出一些相关的口头性的规约。例如龙霞圣“伙”的规约是这样的:“生意”首先只能满足内部成员,每一个成员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与雇主商讨价钱;成员之间有义务相互交流各自所掌握的曲目和技术,但不得擅自外传,尤其是曲目;每月聚会一次,地点可以在“伙头”家,也可以轮流在其他成员家等等。这也是其他“伙”的规约特点的大致写照。规约的宗旨归纳起来不外就是:曲目、技术不外流,有活一起干,有钱一起赚。当某一成员违犯了规约时,惩罚措施一般只是一种隐性的、逐步式的方式,即其他成员包括“伙头”都会不约而同的逐渐不再把“生意”介绍给这个人了,而这个人最终会选择离开并加入别的“伙”。当然这个人也有补救的办法,比如请大家吃顿饭,然后承诺不再发生类似的情况等等。如果是“伙头”违犯了规约,或者他请吃饭道歉,或者更换“伙头”,或者成员都自动离开这个“伙”。但这样的事情并不经常发生,因为,吹奏唢呐一般只用于婚嫁,其收入并不能成为唢呐手的主要来源,充其量只是一份冬闲的副业收入而已,尽管有时候收入也比较可观。唢呐手们最主要是喜欢这份热闹,管饭管烟还有酬金,又比较轻松。因为,较之以前,小车代替步行迎

亲以及汽车的有限空间,都使得唢呐演奏的时间大为缩短,报酬却提高了。所以唢呐手的心态一般都比较平和,并不认为这一行存在着真正激烈的竞争性。

### “伙”的音乐交流

同一“伙”成员的吹奏技术水平,除了“伙头”相对更好一些外,其余的往往相差无几。衡量技术高低的标准主要看成员掌握曲牌的多寡和连续吹奏的能力。所以,“伙”的音乐交流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曲牌的交流,二是吹奏技术的交流。

#### 1. 曲牌的交流

永新婚嫁音乐中常用的曲牌大致有十个:两头游、状元游街、十字调、狐狸摆街、倒四六、顺四六、满堂福、秋月红、凤求凰、过山鸟、爬子调。其中两头游、状元游街、十字调、顺四六、倒四六最为常用,而这五个曲牌中,前两个又使用得最多。当地上百个唢呐手中能熟练吹奏全部十个曲牌的唢呐手屈指可数,龙师傅是其中一个。水平一般的唢呐手通常都会熟练掌握比较常用的五个曲牌,而水平更次者则一定会把两头游、状元游街这两首掌握。

唢呐手之间曲牌的交流通常有两种机会,一是师徒之间的交流,二是伙内成员之间的交流。学习者在加入一个“伙”之前的交流者是自己的师傅,加入伙后可交流的对象则增加了其他成员。他们都是师傅,学习者不用额外送礼拜师,只要平常嘴巴甜些,做事勤快些,就可得到他们的指点。关键还得靠学习者平常多留心记忆、多练习。一般的唢呐手,掌握了五个常用的曲牌,如果没有做伙头的想法,或者也不企望达到龙师傅的技术高度,就不会再求上进了,只是偶尔与伙内成员做一些常规性的交流而已。伙内成员间的交流是一种互通有无的形式,一般是某一成员向其他成员学习自己还没有掌握的曲牌。或是当其中某一成员在哪里偷学到一首新曲子时的相互交流,但这种机会并不多,因为不同“伙”之间的交流很少,同一区域的伙之间的交流更少,相反距离相隔越远,交流的可能性反而更大。因此伙内的曲牌交流的资源一般多是来自其他区域的“伙”。

#### 2. 吹奏技术的交流

吹奏技术的交流则可分为“伙”内的交流和“伙”外的交流。初学者吹奏技术的学习在加入一个“伙”之前,除了得自于师傅的传授,也可能从别的唢呐手处学得。加入“伙”后,除了师傅,还会得到其他伙员的慷慨传授。因为与实实在在的曲目相比,吹奏技术相对显得抽象,传授者教授的只是理论而已,顶多再加上一些示范,关键还得靠学习者自己去领悟。因此,与曲牌的交流上存在一定忌讳相比,吹奏技术在“伙”之间的交流便成为可能,因为抽象的吹奏技术的掌握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而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传授技艺的人却可乘机“秀”一把自己高超的技术,借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尽管“伙”之间吹奏技术的交流较之曲牌更为容易些,但因为大多数唢呐手只是把掌握常用的那些曲牌作为自己的目标,他们对演奏技术的追求多是适可而止或是知难而退,所以,当地的上百名唢呐手中能够精通掌握循环换气的连续吹奏技巧的屈指可数。

龙师傅是其中之一。因此,尽管在曲牌的对外交流上龙师傅显得相对保守,但对于吹奏技术却要开放的多。

### “伙”对当地传统婚嫁音乐传承的影响

中国同业行会的主要功能,从最初的为了贯彻执行政府有关法令,协助政府进行征缴赋税、科买、定价以及平抑市价等管理工作,发展到明清以来逐渐突出协调内外竞争关系和维护成员利益的互助功能,使之从元初的单一突出贯彻政府有关法令、协助行使管理市场职能,向其作为民间同业社团组织的属性方面前进了一步,从而加强了对内对外的规范性协调功能和成员间的互助互济作用。在维护同行业公众利益方面,主要是抵制外来的滋扰,以及协调外部关系。<sup>[15]</sup>但行会的种种规定,有时也会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阻碍作用。

相对上述行会组织的官方性、正规性,“伙”无疑是一个较为松散自由、非正规的,不受任何官方因素影响的民间性组织,但履行的功能却有和其相似的地方。“伙”的规约对伙员的利益有一定的保障作用,加入一个“伙”就等于多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意”渠道,收入也会相应的增加。这对初学者或技术不佳或知名度还没有打开的唢呐手来说尤为重要。定期聚会也加强了成员之间的感情及其他各种资信的交流。同样,“伙”对当地婚嫁音乐传承的影响也非常重要,这里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另一面。

在唱片出现与人们发明收音机和录音磁带以及在人们借助乐谱将音乐固定之前,音乐只能通过口头传承。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后,由于现代大众媒体带来了过多的影响,非洲、亚洲以及北美和南美等的无数传统社会,都逐渐在丧失其传统的口头传承。但作为传统社会的民间音乐至今仍是口口相授、代代相传。<sup>[16]</sup>口头传承者从来就不是个体性质的,而是集体性质的。他们需要一定的场所,在这里,该群体的成员定期要聚会,从而使传统遗产能在记忆中不断得到补充和翻新。这样的场所可以是一个村落,也可以是一种机构,如教会或犹太教堂、宫邸或学校。<sup>[17]</sup>所以,“伙”的积极的一面首先是为当地婚嫁音乐的传承提供了“一定的场所”。因为,“伙”的规约要求成员必需定期聚会,聚会的地点或者在伙头家里,或者轮流在其他成员家里。聚会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交流、传授曲目和技术等,而这样的场合无疑能使婚嫁音乐在伙员的“记忆中不断得到补充和翻新”。二是可以促进唢呐手对更多曲牌的追求和对吹奏技术的精益求精。因为,要想加入一个伙甚至成为一个伙头,没有积累一定数量的曲牌和拥有比较精湛的技术是很难实现的,即使因为师徒关系或者其他亲情关系侥幸加入了,但为了尽早获得独立的地位和更多的酬劳,也会迫使唢呐手虚心好学,勤学苦练。三是可以增进成员间的曲目的互通有无,不断提高各自的技术。在一个伙内,曲目和吹奏技术都是共同的资源,如果说吹奏技术因为悟性或能力、勤奋等原因并不一定能使每个人都能达到同等程度,但实实在在的曲目却是可以达到共享的。所有这些情形在每一个伙内几乎都得到同样的体现,所以“伙”的存在对于有效地传承当地的婚嫁音乐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分散在广大农村的民间音乐班社,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传统音乐文化的自我保护意识,因此也就形成了一道无形的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屏障。<sup>[18]</sup>“伙”也基本如此。“伙”对于其共同资源即曲目和吹奏技术特别是对曲目交流的保守行为就是对音乐传承起消极作用的一面。

当地人对婚嫁音乐审美的追求更重于音响的形式效果,只要音乐的声响能够营造出婚嫁的喜庆热闹气氛即可。所以,当地人对唢呐手的要求往往并不是很高。因此,既然“伙”的规约的存在使得提高技术,掌握更多的曲目如此费劲,当然也就不会有更多的唢呐手去进一步的努力。这种想法普遍存在于当地的唢呐手当中,长此以往必然影响到当地婚嫁音乐的传承。这对于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无疑是一种损失。因为,口头传承的存活能力取决于一个群体的社会整体感。如果一个承载者群体有把口头传统继续进行传承的积极意愿,如果这种口头传承的地点和形式得到保证,那么,一首口头传承的旋律确实可以延续千年以上。<sup>[19]</sup>反之,它可能会在仅仅一代人的岁月里就完全消亡。

### 结语

在永新民间婚嫁音乐的展演中,与纯业余的锣鼓手相比,唢呐手无疑发挥着主要的作用,不仅因为唢呐手们的半职业性质,他们都拥有自己的乐器,都掌握着一定的演奏技术和相应数量的曲目。他们还收取比较可观的酬金,因此使得这个行业的发展在当下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从而催生了一个类似行会组织的民间形式——“伙”,以便依靠它来引导、规范唢呐手在婚嫁这个行业内的隐性竞争行为。尽管与历史上官方性质的行会组织相比,它显得非常的自由松散、不正规,甚至从不引起官方的注意。其实,它也从不期望引起官方的注意,甚至也并不刻意去引起他们的主顾们——将要举办婚事的普通百姓们的注意。尽管它创立的初衷有类似行会的功能,即为了保障本行业,本伙成员的利益而创立,尽管它也有自己的不成文规约,但这些规约却是富于人性化的。这些都使得“伙”不像是一个规范行业竞争的组织,倒更像一个交流音乐的艺术沙龙。所以,尽管目前“伙”对当地传统婚嫁音乐艺术的传播、传承存在一定的问题,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传统婚嫁音乐需求的不断增长和对演奏水平要求的不断提高,以及新一代唢呐手观念的转变,“伙”必将逐步加强多方位、更广泛范围的音乐交流,增强其对传统婚嫁音乐传承的积极作用,使其真正成为交流音乐的艺术沙龙,而不仅仅是地方性的行会组织。

### 注释:

[1]参见:曲彦斌《行会史》第36页。

[2]同上,第4~5页。

[3]同上,第130页。

[4]参见:张振涛《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第207页。

[5]江西省西部吉安市的下属县,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

年),始置永新县。著名历史人物有唐代歌唱家许永新(又名许合子)等,著名音乐文化形式有盾牌舞等。

[6]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通常某一地域的某一行业只有一个行会组织,而当地上百名的婚嫁唢呐手们却是分属于不同的“组织”,只是这几十个的组织都用同一个名称“伙”而已,不同的“伙”之间也并无多少瓜葛。为了便于交流或区分,唢呐手一般会在“伙”之前加一个“伙头”的名字,如龙霞圣“伙”、肖文生“伙”等。

[7]引自田耀农《陕北礼俗音乐的考察与研究》P149,见乔建中《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的讲课笔记》,他认为,以吹奏乐器为主,以打击乐器为辅,打击乐器没有独立曲牌的为鼓吹,吹奏乐器与打击乐器并重,打击乐器有独立曲牌的为吹打。

[8]见田耀农《陕北礼俗音乐的考察与研究》P157,陕北礼俗音乐的主要形式是两只唢呐,三件打击乐器(鼓、镲、疙瘩锣)的小型鼓吹乐合奏。

[9]引自 <http://dict.baidu.com/s?wd=%BB%Ef>

[10]他于1945年出生,吹奏唢呐近40年,技术远近闻名,掌握的曲牌也最多。

[11]当地婚嫁用乐的场合包括婚礼头天晚上的“烘号”程序、第二天的迎亲过程及婚礼的举行。

[12]当地民间婚嫁音乐的两支唢呐是同时齐奏同一首曲牌。

[13]参见:曲彦斌《行会史》第169页。

[14]同上,第131页。

[15]同上,第6~9页。

[16]参见:弗兰德等著、金经言译《开启音乐之门》第37页。

[17]同上,第39页。

[18]参见:张振涛《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第91页。

[19]参见:弗兰德等著、金经言译《开启音乐之门》第39页。

### 参考文献:

- [1]曲彦斌.行会史[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 [2]张振涛.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
- [3]田耀农.陕北礼俗音乐的考察与研究[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 [4]弗兰德等著、金经言译.开启音乐之门[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

(编辑 朱默涵)